

纯文学的 历史批判

毕光明 姜岚 著

培文书系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毕光明 姜岚 著

纯文学的 历史批判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文学的历史批判 / 毕光明, 姜岚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5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ISBN 978-7-301-22398-7

I. ①纯… II. ①毕… ②姜…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4182 号

书 名: 纯文学的历史批判

著作责任者: 毕光明 姜岚 著

责任编辑: 黄敏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398-7/I·262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1.25 印张 316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纯文学”的情怀（序一）

陈晓明

我与光明先生相识多年，他的诚恳厚道与简洁明快的交往方式，总是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说，他是一个特别善待朋友的人。光明兄把近年和姜岚合写的文章的合集出版，要我写点东西，我也干脆欣然从命。

这本名为“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的文集，之所以找我写点东西，也是因为我有一本书名之曰“不死的纯文学”。原来一看书名，我吓了一跳，以为光明先生要批判我鼓捣的那些关于“纯文学”的说法，后来看一下他的文集，我们的观点相去未远。当然，他即使直接批评我的观点，朋友同行之间，我也是欢迎的，我也会写点东西回应，有争论，学理才会深化宽广，才有思想的丰富和锐气。话可说回来，即使观点相近，也可以在差异中展开对话，读光明兄的这些文章，这对我关于纯文学的思考也是一次重新整理的机会。

这部“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的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并非批判纯文学或驳倒纯文学，而是梳理、分析和读解纯文学的历史，在当代文学的历史沿革中来阐释纯文学。其时间脉络贯穿五六十年代至当下，是整个我们称之为“当代文学”的这个时段，以梳理的眼光去看“纯文学”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的那些代表作品所蕴含的文学性意义。

在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纯文学”批判时，文集注重去发掘在政治强大压力下，那些被认为典型的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作品，如何依然具有文学性。很显然，人们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经常采取两种比较直接明确的做法，其一是将其宣布为政治概念化的产物而拒

斥到工具化的文学那一栏目，当然不能认可其具有“文学性”；另一是从“政治正确”（正统的）或“再正确”（“新左派”）的立场，宣布其为“历史正义”的作品。这种观点，只对“历史正义”负责，文学也只有表达了“历史正义”才是有价值的文学，否则纯粹的文学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这部文集显然没有采取如此简单直接的做法，而是既看到这个时期的文学被政治化的现实，同时也看到这些政治化纲领下的文学所具有的文学的价值。在这一论题下，文集首先重点分析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文集的分析表明，《山乡巨变》实际上并没有写多少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斗争，甚至当地的地主一个都没有出场，小说的笔墨放在描写“公与私”的冲突。小说突破了“农村题材”写作的基本模型，弱化了重大题材的史诗性，也没有拔高正面人物，而是对普通人或边缘人物倾注更多的笔墨，同时对“对乡村性格和地域风情倾注了更多的关怀”。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山乡巨变》给‘农村题材’带来了异质性因素。这些异质性因素与已然退出文学现场的‘乡土文学’有更多的联系。”文集显然有一个关于“纯文学”的基本标尺：那就是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的文学，或者说具有现代文学的某些禀赋和元素的作品。

文集打捞“纯文学”的工作十分认真，时有新颖独到的见解。在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解读中，依然能打开不同的视角。文集从小说的原题和改题切入研究，王蒙的这篇小说原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辑部将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来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及其他集子时，作者又将其改为原题。文集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里也使用原题。可见王蒙用这个题目有他的用意。文集的分析很有见地，两个题目的逻辑重音不同，作者的题目放在“年轻人”上，而改题是“新来的”。“这样就牵涉到小说的视角问题。前者是内部视角（尽管是第三人称，但小说的基点是在林震身上，叙述是以林震为视角的），在审美品格上，标明了小说的表现性，而主要不是生活写实。后者成了外部视角，从外面来看小说，不是小说自身生成的题目。如果说作者的题目是小说的眼睛（内部精神的窗口），那么改换后的题目就有点像贴上去的标签。”关

于原题和改题的探讨学界也多有论述，文集揭示得更为清晰透彻。很显然，题目改为“新来的”，突出林震来到组织部后构成的矛盾结构，而不是只着眼于原来的矛盾。现在林震也成为矛盾一极。这篇新解的文章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分析多有见地，对林震和刘世吾的分析也很见深度。

在政治的夹缝中打捞“纯文学”乃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这是必要的。这基于对五六十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作家的基本判断。在对这段文学史持拒斥态度的人们看来，那段文学作品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作家都被政治驯服，都是自觉充当政治的传声筒。于是根本不能去读解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不能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很显然，这也是一种“一体化”的看法。50至70年代的中国无疑是政治高压的时代，知识分子和作家没有任何思想自由的空间。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分离出来讨论：其一，那个时期在文化上试图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理性抱负是否还有值得肯定之处？是否相对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它也确实在文化上开创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这是指那个时期的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主导方面，如何理解其历史意义。它在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所有理念和实践固然体现为对人的规训，但在文化的理想性设计方面，是否有历史的合理性？比如创建社会主义新人，创建一种积极的富有献身精神的文化？比如文艺为人民的方向，让更多的人民享有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民族形式和风格方面，这些是否也有历史合理性？其二，文学的书写具有很强的传统传承的特性，离开了文字书写文学不能成立，既然如此，文字书写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文学性，无法被政治理念所全盘规训的文学意味。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后的所有的文艺作品，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满意过。否则，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可以由着江青把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打成反党、反革命或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那些作家哪一个有主观意图反党、反革命或反社会主义呢？没有。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实际上，说“小说可以反党”更是一项发明。其三，还是要看到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作家对于政治高压的屈服是出于恐惧。有相当部分人是自觉，但也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理念的理解和向往，其中有其真诚性。这种理解如果包含着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话，那也有可能超越企图作为政治控制的策略的

可能，因为这是作家有可能当作新的革命文化来理解社会主义文学的诉求。比如，自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尽管可能有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明显印记，但也是一种创建新型文学人物的探求。这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还是比较有文学自觉的特征的。像《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洼地上的战役》中的王应洪，《百合花》中的小媳妇，《铁木前传》中的九儿，《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甚至《创业史》中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等，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打上政治概念化的印记，但其中包含的社会主义文学要塑造积极的、具有历史主动性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却是在现代性的文化建构中也是有其历史正当性的。

另外，像《红豆》这种作品，文集的分析则打开了那个时期文学在夹缝中显露的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它在革命规训的叙事模式下，它也建立起情感表现的复杂机制。按文集的分析，作者通过叙事的精心设计，采用“间离”法，模糊了对小说主人公的人生选择——去与留——的价值判断，把对爱情悲剧的遗憾长久地留在了读者的心中。《红豆》的对人物的情感复杂关系，矛盾与迷惘的表现，并且有保留地给出价值判断，反倒让人们体验到生命、亲情伦理、政治以及爱情之间的缠绕关系。这就显示出文学叙事的能动性，所谓“纯文学”，也在这些夹缝中不可能压抑地有所流露。

对“纯文学”的梳理对于这部文集来说，也是一次重读，其重读的角度与前此的“重读”颇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了文学性的角度。很显然，影响颇大的“再解读”并不想赋予价值立场，只是读解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表征的那种意味，固然有值得肯定的甚至令人兴奋的学理意义。至于再解读的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的意义，或者是否具有审美的效果，则始终语焉不详。因为肯定其文学意义则要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政治评价的立场，阐释政治性的叙事就要有明确的判断。显然，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这部文集则在文本的细读中，去发掘那些被政治压抑的文学性，政治还是被指认为压抑性的，只是文学文本有时无法全盘被压抑，有缝隙撕裂开来。

在论述“新时期”以来的那些作品时，这本文集就自如得多。关于铁凝的《哦，香雪》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主要是就表现新时代的可能性方

面来揭示其社会意义。也有把它放在对比结构中来重新审视,例如,把它所表现的80年代乡村女子的希望,与90年代中国南方工厂女工的凄凉现实对比,从而揭示出文学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分裂,这些读解无疑都有其独到的学理意义。毕光明和姜岚显然也不愿在众多的分析阐释面前止步,他们要做出自己阐释。文集试图在“诗性叙事”上来定义这篇小说的文学意义,尽管“诗性叙事”也是附着于它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方面,诗性来自乡村女子寻找未来美好理想的那种心理和行动。这种积极性以及实现的途径表明,80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给乡村的女孩也带来了希望。“它以人格成长的人文内涵和主观化的表现方式,加入了‘文学回到自身’的努力,呼应了再度奏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主旋律。”确实可以看出这部文集对“纯文学”情有独钟。

文集因为秉持“纯文学”的肯定性立场,对意识形态倾向性过于鲜明的作品给予相当直接的批评。《那儿》是近些年来被一部分评论家十分推崇的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代表作,文集中收录的《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对《那儿》提出直接批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算是较早的发表质疑观点的文章。文集指出,为写底层而写底层,小说就可能成为愿望和概念的产物。事实上,小说以《那儿》为题,就是对一个象征一种已逝理想的概念的诠释。这篇小说试图把工人阶级的命运与共产主义理想相依存结合在一起,现实逻辑并不牢靠,小说结局让朱卫国自杀也很生硬,文集尖锐指出,“《那儿》的备受关注,引起热评,主要不是小说为文学把握现实提供了多少新经验,而是它成功地促成了一次思想者的集会”。

毕光明先生和姜岚对纯文学确实怀着一种理想性的态度,但同时也保持着历史的眼光,在这本文集的后半部分,有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探究“纯文学”这个概念,尤其是在当代批评话语的对话中来接近厘清这个概念。说到底“纯文学”这个概念只是一项命名,正如文学也是一项命名一样。它必然经历历史的演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纯文学”观念,不同的民族国家也有不同的“纯文学”观念。这就是说,“纯文学”这个概念是历史的、民族的,也是相对的,它并不能被实体化,也没有本质化

的存在，或许它并不存在。按照德里达的看法，文学或许也并不存在，因为文学也没有本质的存在，文学存在边界无法定义，文学是一种奇怪的建制，它可以写任何东西，甚至任何文本都可以称之为文学。但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放弃“文学”的概念，我们总是怀着一种关于文学的理想性态度在谈论文学。同样如此，之所以要借助“纯文学”的概念，是因为如今“文学”的概念越来越宽泛，边界愈来愈模糊，文学越来越多样化、分层化。因此，有一种与传统经典文学联系更为紧密的文学，有一种不能被观念性的强大力量全部消除的文学，不能被快感、消费和娱乐全盘清除的文学，它们或者是一种文本，或者是文本中的质素，或者是文字的痕迹，总之，是书写事件中能进入人的精神性世界的那些东西。

总之，毕光明先生和姜岚带着自己的文学情怀，梳理当代文学穿过政治的和历史场域的那种倔强性，也呈现了文学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困局中存在的状况，他们让我们相信文学的存在，相信文学能够存在下去，这是可贵的。

是以为序。

2012年10月28日于北京大学

执着的坚守与开阔的视野（序二）

吴义勤

毕光明先生一直是我所尊敬的学者。在当代喧嚣浮躁的批评环境中，毕光明先生一直有着安静的研究心态，有着坚定的学术立场。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扎实厚重，朴实稳健，更重要的是始终贯穿着其坚定的“学术之骨”，即毫不含糊的“纯文学历史批判”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向度。这本《纯文学的历史批判》就是他和姜岚近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他的纯文学是对于文学启蒙化审美维度的坚守，他对文学的评判、衡量和褒贬，都是建立在启蒙化的审美性探寻之上的。这种姿态和风格，延续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学术理想与学术热情，在文学价值面临巨大分歧的当下文学研究界，可谓旗帜鲜明，独树一帜。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新一轮研究方法论的更新热潮，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两天，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后”思潮，大都来势汹汹，有席卷天下之势，这也使得求新、求变的研究界趋之若鹜，很多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人，罔顾文学的基本特性和存在价值，试图在不断的学科越界和方法论更新上吸引眼球，博得关注，却往往对理论囫圇吞枣，生搬硬套，在边界的泛化中丧失文学应有的价值，既很难实现所谓的“大学科综合”，也很难达成文学研究的真正繁荣。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些批评家故弄玄虚，生拉硬扯，丧失了文学审美的基本判断，将文学批评论为其他学科的辅助阐释工具。这其实是“种了别人的菜园子，荒了自己的地”，无疑值得文学研究者高度警惕。在这种背景下，毕光明先生的研究就尤为难能可贵。他对纯文学性的坚守，并不是一种固步自封，

而是在坚定的文学立场之上，追求海纳百川的从容、为我所用的气度和争鸣创新的勇气。用毕光明的话说，就是“选取当代富有艺术创新价值的作品，将其置于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学思潮演变的背景上，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构建，多角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着力阐释作家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革命话语及其社会实践规制人生和扭曲人性的艺术批判，论证纯文学以想象性的内心生活证明人的自我生成本质的独特价值”。无论是具体的文本细读，还是对文学史的梳理和总结，毕光明总是在文学性的标准之上，充分运用历史的、发展的观念，对评判对象进行历史的批判。他不排斥诸多阐释方法的运用，但阐释的目的，在于对作品的文学性，或者说，文学性如何“发生”，如何“构成”，如何“显现”，进行细致扎实、有理有据的论证。他的研究同时又不失史的视野，他追求阐释的历史化与反思性。他注重还原文学文本具体复杂的历史境遇，并以“理解”的姿态，找寻它们内在的文学规律，探究它们独特的文学品质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纯文学的历史批判》涵盖范围广博开阔，研究视角细致独到，话语阐述明晰准确，学术态度严谨认真，做到了审美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从整体概念到研究细节，都为纯文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话语空间。既有对宗璞、王蒙、莫言、苏童、韩少功、铁凝、范小青、池莉、路遥、牛汉、曾卓、北岛等当代实力作家的研究，也有对麦家、鬼子、陈希我、王手、盛可以、阿袁、方格子、陈蔚文等新进作家的解剖，既有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背景下文化冲突与人性实现问题的审美思考，也有对思想解放语境中纯文学写作的新的可能性的挖掘。毕光明的研究是以他对“纯文学”的理解为出发点和基础的。他对“纯文学”作出了新的界定，他所谓的“纯文学”，不是一种语言学化的、精英化的纯文学观念，也不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秩序的单方面认可，而恰恰是建立在历史性地反思文学史和文学体制的基础上的。毕光明既对新时期文学体制中遗传自十七年文学生态的“遗毒”，抱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又对当下无限制、无边界的解构狂欢持否定态度。对于纯文学性提法的局限，很多批评家都表达过真知灼见，例如，李建军就指出：“纯文学”一般被用来强调文学的美学品质，尤其是被用来对抗文

学上的极端功利主义主张——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它有助于克服庸俗的拜金主义对文学的扭曲，有助于对抗压抑性的外部力量对文学的异化，显示出一种抵抗和解放的性质，这就是说，这个概念具有很强的“语境性”和“工具性”，是一个权宜性的概念。如果无限制地用它来阐释文学，就容易用“唯美主义”误导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容易将一个时代的文学引入一个脱离现实的纯粹“想象”的世界，从而将自己时代的文学引入格局卑浅的困境甚至死胡同里。^①而在毕光明看来，纯文学的定义，并不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即纯文学与现实批判性的天然二元对立——纯文学就不关心现实，批判现实的就不是纯文学。在毕光明的视野中，当代文学可以分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三个版块。纯文学从来就不是权力话语也拒绝权力话语而具有另外两类文学不可相比的超越性，它以想象性的内心生活证明了人的自我生成本质。它对审美性的追求要大于其他两种文学类型。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审美主义（纯文学）反拨政治功利主义（严肃文学）的深刻原因。而他又马上认定，纯文学研究不过是多元研究中的一元，它对审美性的关注，是它永远的合法性基础。而纯文学的标准，又是历史建构而成的，但正是不断重构又瞬间稳定的文学现实，在层构性的动态关系中，呈现了纯文学的价值。由此可见，毕光明对纯文学的定义可谓煞费苦心，他试图在永恒的普适性价值标准和历史性的构成主义之间，找到自己的文学理想之地。其实，毕光明对于纯文学的审美性品质的认定，无疑扩大了通常流行的审美性的概念。这种纯文学的理想，包含着他对经典启蒙文学形态的偏爱，即普适的人性标准和不断创新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毕光明坚持的是一种开放的“纯文学性”，既坚持文学性基本功能与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又能在历史的反思维度上，利用多种方法论，以开放的姿态，对多样化的文学形态进行有效阐释和引导。

这种双向的坚持，是与毕光明对当代文学史的看法一致的。在《社会主义伦理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长文中，毕光明对十七年文学形成的革命文学体制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他认为，十七年形成的红

^① 李建军：《纯文学、小说伦理与“新国民性”》，载《文艺报》，2009年9月5日。

色写作，成了无与抗衡的文学主流，成功地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形态，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着意追求的新型文化生态的象征。红色写作的成就是以可以与其在民族新文化建构中形成功能互补的其他各种写作的胎死或夭折为代价的。这种从伦理的角度，介入十七年文学本相的方法，非常有勇气，也很有眼光。更重要的是，毕光明对十七年文学的这种解读，不仅是关乎当代文学的整体构架、分期和价值判断，而且关乎着对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各种问题和症候，比如后现代问题，价值杂糅问题，欲望化写作症候问题等的“关键点”所在。毕光明认为，正是十七年革命文学的伦理结构，导致的这种不正常（不平衡）的文学生态，才造成了当下文化困境与文化颓败。他大胆指出，由社会主义伦理冲动支持的十七年的以政治教化为目的的文学，并没有实现它的倡导者毛泽东所希望的让劳动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理想。因为50—70年代的某些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构对应（群体本位、政治道德化与强求人的圣化），决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可能完成人的觉醒（人被鼓动投身革命集体，成为社会主人，获得的是外加的主体性，而不是自省的主体性）。另外，阶级斗争的鼓吹，严重地恶化了人性，破坏了人际关系，从根本上伤害了社会道德。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新时期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看成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背弃了文学的人文传统、切断文化血脉，用阶级性和斗争意识取代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营造的红色文化生态的后遗症。

这种“看似旧的，却是新的”纯文学观点，具有很强的精神指向性，对整个当代文学史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角度。在本书中，对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重读，是毕光明最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对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青年人》的新解，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细读个案。在这篇长文中，毕光明敏锐地从小说题目的变化中，发现王蒙小说的一种心理和精神冲突的人格类型，并发现小说以林震的心灵为端点，形成一个扇形结构。它有两极，一极是与韩常新、刘世吾的冲突，这是与机械力量的摩擦。另一极是人的纠葛，即与赵慧文的心灵感应，两者相遇引发的情绪波流。这种从小说的细微处见创作主体心理，从细节处考察潜文本的功夫，十分精

到。而从“林震是个个人主义者”、“被组织：刘世吾的悲剧”等人物角度的分析，既有扎实的细读和形象解剖，又有比较新潮的对福柯权力关系的洞察和对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分析视角的运用，显得视野开阔，论证有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和阐释，其目的和旨归在于说明十七年文学体制的伦理化机制是如何对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作家进行驯服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作为文化权力的内部复杂关系，即抵抗和规训的双向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其中洋溢的是评论家的真诚的启蒙精神和对现实制度的反思。在对《山乡巨变》的解读中，毕光明通过复调理论，发现在该小说文本中，存在着风景描写对主流阶级话语的抵牾，而潜文本中让拟作者虚化为国家干部和革命作家身份，将叙述立场偏向农民，不加掩饰地表现他们对这场要拿走寄托他们发财致富梦想的土地的革命运动的怀疑态度和抵触心理。正是建立这个坚实解读的基础上，毕光明认为，《山乡巨变》的文学性要高于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更为同质化的《创业史》，这种发现的独到眼光和勇气，无疑令人钦佩。对杨朔散文的解读，曾呈现出一边倒的道德化批评态势，认为杨朔的散文，是典型的主流宏大叙事，存在着叙事的虚假和夸饰，从而远离文学的本质。然而，在毕光明的阐释中，却对杨朔的散文，进行了充分“历史化”的批判，即既能看到他创作中的问题，又能以历史化的批判态度，以历史的“同情”的目光，看到杨朔散文中残存的“悯农意识”真实成因和表现形态，一方面肯定杨朔的真诚，另一方面，更看到这种真诚是如何被统治阶级的红色革命话语方式“改造”的，这种改造如何变成作家内在的感恩之心的。类似的分析，还有对国统区的诗人和作家臧克家是如何在建国后通过新诗革命话语的权威化过程，隐藏并销蚀自我个性的精彩阐释。这些具体的作家和作品研究，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当代文学的阐释空间，对当代文学史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纯文学的历史批判》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对于路遥的解读。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说他特殊，是因为他的创作，具有一种浓厚的现实主义启蒙精神，路遥的创作，实际上是新时期启蒙文学精神最后的光芒。路遥以理想主义的道德品质，打动了广大读者的心。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启蒙的退却，文学的碎片化、娱乐化

导致了启蒙精神的慢慢衰落。而作者姜岚恰恰抓住这一点，来阐明自己对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冲动，对启蒙精神的推崇。她以对路遥小说中的城乡差距、路遥小说的爱情模式及其人文功能的揭示，来说明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启蒙品质。对路遥的小说，在80年代，多强调他的现实教育功能，而在90年代，则因为它的现实主义笔法和与柳青等小说的联系，而被视为一种落后的文学实践。到了新世纪，在“新左派”的兴起的背景下，新的路遥热和柳青热作为对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一种遥远的祭奠和追忆，被用以批判当下理想主义的丧失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姜岚的解读则与此有着明显的不同，她从启蒙的精神来考察路遥的小说，认为这些小说的主题是反映农村知识青年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他们在苦难中奋斗向上的人生体验。她认为，路遥对“历史夹缝中的一代”的精神气质的发现，以及对人物性格现代性品质的注入，塑造出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代表的与“十七年文学”有否定关系的文学新人形象。这种对路遥的认可，和“新左派”的价值姿态有很大差别，但同样具有现实批判性，她的批判姿态是历史化的，将制度对农村的不合理安排作为农村的苦难根源，这是非常有勇气和见地的。也就是说，姜岚对路遥小说的再解读，不仅重新发掘出了路遥小说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批判眼光，而且，通过在新世纪的语境下的再解读，表现出了批评家本身对历史问题延续性的理性忧虑。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甚至有些地方的乡村在房地产的狂潮下，已渐渐地消亡，出现了郊区化等新的情况。胸怀理想而在现实中苦苦挣扎的乡村新一代孙少平和孙少安们，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在肯定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启蒙品质的同时，论文作者依然将“审美性”作为现实主义纯文学性的内在要求，对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质的发现和总结，也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路遥作品的认识。

除了对新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精彩解读之外，对当下作品的现场跟踪，对当下优秀作品的及时推介，对当下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准确批评，无疑也是毕光明和姜岚的学术研究值得称道的地方。毕光明他们并没有因为现场批评的琐碎和庞大的阅读量而望而生畏，反而将对文学史的颠覆性思考，贯穿到了他们对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启蒙文化关怀之中。他们对当下作品的批评，不隐恶，不溢美，不抱名作家的粗腿，对于盛可以、王

手、麦家等新锐作家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从没有对普通作家有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怀着一颗对文学的谦卑和好奇之心，客观分析，大胆论断。他们的批评追求，对于建立绿色的、生机勃勃的批评，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纯文学的历史批判》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最具有建设性的重要成果之一。对于如此坚实的著作，除了表达佩服和敬意，其实是不敢多言的。但光明兄嘱为之序，坚辞不允，只好写下以上文字充数了。

2012年秋匆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纯文学”的情怀(序一)	陈晓明 5
执着的坚守与开阔的视野(序二)	吴义勤 11

文学体制与文学性格

社会主义伦理与“十七年”文学生态	3
溢出主流意识形态	
——《山乡巨变》的乡村叙事及其文学价值	11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新解	31
难以突破的禁区	
——《红豆》的爱情书写及其阐释的再考察	41
捍卫的代价	
——臧克家与当代文学权威话语	48
被修改的仁爱精神：杨朔散文中的悯农意识	
——以《荔枝蜜》为例	53
沉沦灵魂的自我救赎	
——“七月派”三位落难诗人的悲怆写作	59

新启蒙变奏

人的文学：从“伤痕”到“反思”	69
新诗潮：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	78
踩在历史门槛上的宣告	
——北岛的《回答》	96